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57 期（民國 96 年 9 月），227-232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
東京：岩波書店，2000。441 頁。

陳永發**

擁有 13 億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管如何「告別革命」，名義上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擁有 6,000 萬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組織。英語世界對中國共產黨是怎麼在中國出現的，異常好奇，Arif Dirlik 已經有很好的英文研究；中文世界對這個問題尤其垂注，有關著作車載斗量。很難想像，誰還能另外寫一本新書，寫出一本充滿新發現的作品。京都大學的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以實踐證明這樣的懷疑是多餘的。他從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濫觴開始，上窮碧落下黃泉，像史學界的福爾摩斯一樣，竟然又找到以前學者所不知道的中、日、英、俄文線索，並詳加考訂，寫出了一本引人入勝的精彩作品。

中國大陸的黨史專家在回顧中共的成立時，腦際很難擺脫毛澤東的一句話：十月革命炮聲一響，俄國送來馬列主義的禮物。中國知識分子從此走上馬列主義的不歸路。其次，他們強調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中國的工人無產階級隨著中國資產階級在第一次歐戰中的壯大，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社會條件。這兩個論點，經過 Arif Dirlik 的仔細研究以後，都遭到有力批駁。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式的馬列主義對中國的思想界並無立即影響，中國知識

* 另有中譯本：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417頁，加上附錄、參考文獻和後記。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分子在 1919 年五四運動以後，確實有向社會主義轉向的情形，但與其說是受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不如說是受歐戰後歐、美、日資本主義國家動盪不安的刺激。中國知識分子從歐、美、日等先進國家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中，看到中國的未來，而有意東施效顰。其實，他們既不了解中國的工人階級，中國工人也不會表現強烈的階級意識，遑論有謀求成立中國共產黨這種組織的旺盛企圖心了。

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因此它成立五年以後，工人黨員所佔的比例方勉強超過知識分子黨員。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不是單純的思想流行的問題；做為一個必須採取行動的組織，需要足夠的外來援助，否則建黨之初不可能印刷那麼多宣傳共產革命的出版品，更不可能有那麼多的黨員可以在糊口維生之外，投入消耗精力的工人和革命運動。毛澤東曾經承認，建黨初期如果沒有蘇聯的生活津貼，他不可能有多少從事革命運動的餘裕。Dirlik 因此強調中國共產革命的國際因素，強調共產國際提供中國共產黨具體的工作經驗和經濟援助，但他同時更強調相隨而來的組織和意識形態，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之下，清理黨內其他非正統的共產主義思想，尤其是無政府主義，結果把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帶向俄國式馬列主義的死胡同裡。石川禎浩並不像堅持左派立場的 Arif Dirlik 一樣，想從破產的毛澤東革命中，拯救其個人對俄國化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但是他的看法卻大體符合 Dirlik 關於中國共產革命必須強調外鑠力量的見解。他特別指出，建黨之初，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Gregory Voitinsky)離開中國以後，創黨領袖陳獨秀也同時離開上海，到廣州另尋財源，結果各地方的組織和宣傳活動都因為沒有經費而全陷於停頓。石川禎浩只是沒有進一步指出，對共產國際的財政依賴，促使陳獨秀終於在 1922 年同意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所屬支部，從此以後，中共更是非視共產國際為中國革命合法性的來源不可。正因為共產國際是各地區共產革命經濟支援和合法性的泉源，1920 年代才會有好幾個中國社會主義組織同時到莫斯科爭取共產國際的承認，而

共產國際只要拒絕提供承認和援助，他們的組織不需要多少時間就成為過眼雲烟，甚至沒什麼人記得它們曾經存在過。

石川禎浩打破了中共官方黨史強調共產黨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的思維框架，也澄清了中共成立時期的許多重要細節，尤其釐清了中國知識分子輸入共產主義思想的過程。稍微涉獵中共建黨史的人都知道，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潮，來自日本的影響最大，卻不太清楚到底是受到哪些日本社會主義人士的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是通過什麼管道得到相關知識的。石川禎浩在此書中詳細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在歐戰以後的日本進入復蘇與發展的局面，中國蓬勃的出版界和新聞事業則及時扮演了輸入日本最新思想的重要角色，熱情地加以介紹。不僅中共大力揄揚的李大釗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後來中途離開中共的留日學生李漢俊、李達、施存統諸人也都與有功焉，尤其不可以忽略的是中共黨史專家視而不見的國民黨員，譬如後來成為蔣中正頭號反共智囊的戴季陶，他在當時不僅是第一流的日本通，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之深，更可以說是不做第二人想。戴氏曾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籌組工作，後來因為效忠孫中山而中途退出。石川禎浩最重要的發現則是《晨報》記者陳溥賢，後來改名陳博生並投效國民黨，還追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竟然比李大釗更早介紹日本馬克思主義到中國，甚至很可能是李大釗走向馬克思主義道路的引路人。石川禎浩進一步指出，無論陳博生還是戴季陶，他們擁抱社會主義都是因為反對帝國主義的緣故，所持的理由均是：除非日本順應時代潮流，徹底改變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打倒當權的政客、軍人和資本家，則中日兩國不可能世世友好。

石川禎浩在詳述日本馬克思主義如何輸入中國之後，又進而指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仍然難以滿足其資訊和知識上的需要，因此又從英語世界尋找有關俄國革命的訊息，以致美國有關於十月革命以後俄國的各種報導，也就成為中國對列寧無產階級專政和組織的重要知識來源。例如《新青年》的俄羅斯研究專欄，就完全取材於紐約發行的俄共宣傳刊物《蘇維埃俄羅斯》

(*Soviet Russia*)，難怪胡適曾批評這一個專欄根本是《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語帶嘲諷；石川禎浩則強調知識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強調若不是英文世界提供這些知識來源，後來共產國際派人到中國活動，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就是予以全力支持，也不可能那麼快就出現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

石川禎浩仔細討論負有秘密使命的俄國新聞記者魏金斯基的來華經過，以及此後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間一年幾個月的歷史，詳細比對各種原始資料以後，發現許多向為學界採信的回憶錄記載都有問題，而且錯在重要的歷史細節上：譬如政治學者高一涵強調，在魏金斯基出現於中國之前，陳獨秀和他的北京大學同事李大釗已相約建黨，有意無意之間強調中國共產革命的本土性格；其實高一涵當時正在日本，豈能見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一事？又例如，中國共產黨自己考訂出來的誕生日是 1921 年 7 月 15 日，石川禎浩則加以推翻，認為正確的生日應在 1920 年 10 月這個月裡，至於 1921 年 7 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則是共產國際代表催促和指導下召開的第一次年會，根本不是什麼黨組織成立大會。中共所以堅持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 7 月，目的在提高毛澤東的創黨人地位，因為在這一個月毛澤東首次擠進中共的領導圈內。當然根本的原因仍是，當初黨內沒有人想到，紅色的濫觴竟然蔚為歷史洪流，所以也沒有人好好記下自己黨的誕生日。

石川禎浩提到，當時全國學生聯合會在時代潮流的驅使下，曾發展成為共產黨，又叫大同黨；其領導人姚作賓不久以後便淹沒無聞，消失得無影無蹤。石川禎浩知道這個姚作賓後來做了漢奸，但是在正文中卻強調姚作賓於 1922 年到莫斯科活動，正好「證明了五四運動即使在組織方面——儘管與正宗共產黨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並且不久就消逝了——也是朝向孕育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並且與蘇俄的對華推動工作密切相關的。」石川禎浩如此措辭，不無誇大五四學生運動左轉的嫌疑。石川禎浩指出，姚作賓是當時全國學生聯合會七位委員中的一位，組織大同黨時僅有兩位委員相隨，也承認對姚作

賓共產主義信仰的內容完全不清楚，對其生平更缺乏足夠的理解；儘管如此，卻仍以他的左轉證明五四運動的發展是朝向孕育共產組織，是否推論過分大膽？姚作賓到莫斯科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援助，很可能只是少不更事，追逐時髦，或熱中政治，藉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名義，累積政治資本。即因此故，一旦遭挫，姚作賓組建的共產黨立即化為過眼雲烟。

這個推測有些許根據。點點滴滴的資料顯示，姚作賓是四川南充人，祖孫三代寄居青島，「富甲一方」，動產和不動產無數，留日期間開始投入社會主義運動。因為共產國際拒絕給予支持，後來和陳獨秀的共產黨毫無瓜葛，抗戰爆發後不久，立即向日本侵華軍隊輸誠，擔任青島市市長，日本戰敗後，成為國民政府接收官員覬覦財產的好對象。¹姚作賓在對日抗戰爆發後不久，便選擇了一條與五四愛國主義完全相反的道路，是為了什麼原因？為何中共創黨黨員中的周佛海和陳公博，以及石川禎浩所謂冒牌共產黨員中的江亢虎諸人，也都從相信共產主義走向背棄共產主義，最後更走上追隨日本軍國主義的反共道路？早期宣傳馬列主義的不少人物，像國民黨的戴季陶、沈定一，還有無政府主義者的黃凌霜、最早介紹日本社會主義的陳博生和成舍我，以及李達、李漢俊、施存統等人，若不是從未加入共產黨，就是很快離開共產黨，這到底何故？石川禎浩都沒有討論。反而從後設的立場以「偽」和「冒牌」形容姚作賓的組織。從思想堅貞、黨性堅強的角度來看，姚作賓確實是「偽」和「冒牌」，不可能成為中國大陸作家葉永烈所說的「紅色的起點」，也不可能成為中共黨史專家李新和陳鐵建所說的「偉大的開端」。但是非常諷刺的，石川禎浩這本大作竟然找來 1927 年武漢清共期間在國民黨《中央日報》登報離開共產黨的施存統，作為早期中共黨員的典型，並據以說明是什麼樣的五四青年才參加中共建黨的活動。施存統的故事卻警告我們，中共創黨時期的黨員，不全是鋼鐵般的材料，有其軟弱、彷徨、動搖的一面，甚至

¹ 周紹賢，《滄桑回顧錄》，未刊稿，冊3，頁6；青島檔案信息網，<http://www.qdda.gov.cn>, 1949年2月18日國民黨法院三審大漢奸姚作賓，2006/4/12。

想重新思考另類政治抉擇。

這本書的中譯本流暢可讀，日文原書固然寫得好，但是翻譯者的能力也應該給予肯定。頁 2 有一段引自芥川龍之介的話，不小心被攬入正文，然而不影響全書品質。偶而有些人名弄錯，張斯馨在原作中已經被誤為張斯麟，但是夏丐尊作夏道尊、葉明勳作葉明勤、高畠素之作高堺素之，肯定是手民之誤。比較值得注意的問題，倒是譯者為了適應中國的政治環境，徵得作者石川禎浩的同意，刪改了一些違礙文字。這主要發生在原作者的後記當中，例如中文本後記提到李漢俊的後人李丹陽女士，僅說感謝她惠寄有關早期來華俄人的研究論文（未刊稿），但是石川禎浩在日文原作中卻另外強調，李丹陽女士的看法有異於中共主流史觀，所以在中國大陸無處發表。又如翻譯本後記中日文原作的幾段話不見了，因此讀者不知道石川禎浩在中國發表散篇論文時，中國大陸的出版單位堅持刪除有關中共生日的考證部份。本書中譯本經過作者的妥協以後，終於能夠在中國大陸面世，顯示中國大陸的文網雖然猶存，卻已有放寬的跡象，至少已能容忍外國學者置喙中共視為禁臚和禁區的一些議題，並提出不同見解。中共憲法中有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不知道這一放寬是否來自這個條文的逐漸落實，但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凡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都能真正享受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免於中共宣傳部門文網的箝制。